

讖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关系

吴从祥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依据文献史料,分析了讖纬与汉代迁都思潮之间的关系、讖纬对汉代都城文化的影响。分析认为,西汉末士人欲以迁都解“更命”之危机,王莽欲迁都以应讖纬;光武修旧都以证其承“尧后火德”之正统,却导致了人们的迁都之念;明帝时人们怀疑都洛不应天命,于是迁都之议再起;董卓以图讖为由迁都长安,曹操迎天子于许昌,曹丕应图讖而代汉。分析还认为,迁都思潮往往是国家信仰危机的产物,往往与权力之争和政权变迁密切相关;受讖纬天命思想影响,都城不再仅仅是行政区域的代称,往往成为天命的象征。

关键词:汉代;讖纬;迁都;政治神话

中图分类号:K234.1/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2-0023-05

都城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往往也是该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此其地位极其重要。在早期的国家中,由于国势发展等原因,时有迁都之举,如商代盘庚迁都于殷、越王勾践因国势向北扩张的需要而迁都琅琊等。迁都不仅与国势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讖纬是盛行于汉代的重要社会思潮,自其产生以来便对汉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大至朝代更替,小至地名更改,无不受到影响。有汉一代,迁都思潮不时出现。细而察之,有汉迁都思潮皆与讖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

一、西汉末迁都之议

经过六十余年的修养生息,到了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进入鼎盛时期。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对匈奴用兵数十年,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惨重的,以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海内

虚耗,户口减半”^[1],汉帝国从此走向衰落。随着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深,人们对汉帝国逐渐失去信心,“更命”思潮盛行于世。“更命”就是“更改天命”,即由下一位受天命者来代替旧受命者。从以往朝代更替来看,更改天命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和平禅让,如尧禅舜、舜禅禹等;一种是暴力革命,如汤伐夏、武王伐商等。择贤禅让是“公天下”时代天命更替的方式,是儒家向往的理想“王道”。暴力革命是“家天下”时代天命更替的重要方式,虽然非理想之法,却依然为众儒所接受,大多儒生盛赞武王伐纣便可说明这一点。

汉昭帝时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如泰山有大石自立,上林苑有僵柳自生,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等。后来人们往往将这些与汉宣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汉宣帝起于民间的征兆。眭弘以《春秋》之意推之,认为“此当有匹夫为天子”,劝说汉昭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1]。战国后期邹衍提出五德

收稿日期:2011-03-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09YJC751061)

作者简介:吴从祥(1973-),男,江西九江人,副教授,博士后。

二、东汉初迁都之议

东汉初期,迁都之议前后相续了数十年,这次迁都之议也与讖纬有着复杂的联系。

破铜马赤眉之后,刘秀实力渐强。是时除更始帝之外,孺子刘婴、公孙述等先后称帝,于是群臣劝刘秀称帝。在此之前,刘秀已闻知“刘氏复起”、“刘秀当为天子”等讖言,并且颇为动心。光武不应群臣进谏并非其无称帝之心,只是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因此犹豫不决。此时,刘秀同学彊华从关中带来《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2]。托名于孔子的《河图赤伏符》非民间流传的讖言所能比拟。至此,刘秀相信天命在己,于是称帝于鄗。当其部将攻下洛阳后,光武便定都于洛阳。《东观汉记》云:“自上即位,案图讖,推五运,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水生火,赤代苍,故上都洛阳。”^[3]《东观汉记》为东汉刘珍等人奉命编撰的官史,此说可信。这表明最初光武是以图讖而定都洛阳的。

王莽的倒行逆施导致士群对他的失望,于是人们转而“思汉”,相信天命依然在汉。在反莽运动中,拥汉、思汉成为反莽的政治纲领,“历观诸起事者,非自称刘氏子孙,即以辅汉为名,可见是时人心思汉,举天下不谋而同”^[4]。“刘秀当为天子”、“刘氏复兴”等讖言早在王莽之时便流传于世。光武名号见于图讖,再加上“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之。”^[2]于是光武成为众望所归。从高祖刘邦算起,刘秀为其九世孙。于是出现大量“赤九”、“九世”兴汉的讖纬。《河图》:“图代出,九天开明,受用嗣兴,十代以光。”^[2]《河图》:“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2]《洛书甄曜度》:“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逸刻封。”^[2]《河图会昌符》:“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2]此外,人们借讖纬将刘秀出生神奇化。刘秀生时,“是岁嘉禾生,一茎九穗”^[3],因以为名。“一茎”指刘秀与高祖刘邦一脉相承,“九穗”指自高祖至其身为九代,“一茎九穗”暗示九世刘秀将重兴汉朝。可见,讖纬多方面为刘秀承汉火德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刘向父子提出“新五德终始说”,认为“汉得火焉”^[1]。“汉家尧后”说出自讖纬^[5]。二者合流,产生“尧后火德”说。为

终始说,以解释朝代的更替。董仲舒提出三统说,以三统循环来解释朝代的更替。五德说和三统说虽然从宏观上揭示了朝代更替规律,但并没有说明朝代更替的具体方式。夏、商、周三代更替是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实现的。而眭弘将禅让说融入三统说,倡导汉昭帝顺应天命,择贤禅让。在“家天下”的汉代,择贤禅让自然不为君主和朝臣所接受,眭弘以此反招杀身之祸。虽则如此,但“汉命已尽、当更受命”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虽然从理想的“王道”角度而言,“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1],天命行尽时应主动择贤禅让。这便是眭弘上书劝说汉昭帝禅位的原因所在。可是从现实政治出发,忠君救国是每一个士人,特别是在位食禄者的天职。当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士人有义务承担起拯救国家与人民的责任,挽狂澜于既倒,而不是顺风推危墙。正是出于现实的职责,一些士人努力设法解汉之危、延汉之命,于是人们提出了一些变通的“更命”方式。翼奉的迁都说便是一种变通的“更命”方式。汉元帝初平三年(前46年)孝武园白鹤馆灾,于是翼奉上疏曰:“故臣愿陛下因天变而徙都,所谓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终而复始,穷则反本,故能延长而无穷也。”^[1]虽然翼奉话说得比较含蓄,但其主旨是很明确的,汉气将尽,宜当以迁都的形式“更命”,以解汉之危,延汉无穷。迁都并非易事,再说迁都能否解汉之危还是个疑问。正因如此,迁都之议在西汉末年并没产生太大的影响,相反,禅让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在一片符命声中王莽篡得汉位。新莽时期,迁都思潮并未消亡。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王莽有迁都洛阳的意图。“是时,长安民闻莽欲都洛阳,不肯缮治室宅,或颇彻之。莽曰:‘玄龙石文曰:“定帝德,国洛阳”。符命著明,敢不钦奉!以始建国八年,岁缠星纪,在洛阳之都。其谨缮修常安之都,勿令坏败。敢有犯者,辄以名闻,请其罪。’”^[1]可见,王莽受讖纬的影响,欲迁都以应天命。可是此举尚未施行便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导致人心动荡不安,王莽不得不以国家政权加以干涉。终王新莽朝,再无迁都之议,迁都计划遂以破产。

从以上可以看出,因社会危机加深,人们“厌汉”情绪越发强烈,反汉图讖越来越多,于是忠君之士欲以迁都来解汉之危。到了新莽时代,王莽欲迁都以应天命,讖纬成为迁都的主要理由。

了强化自己承汉火德的正统性,称帝次年(26)正月,“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2]是时,赤眉掘长安诸帝陵,光武于是遣“大司徒邓禹入长安,遣府掾奉十一帝神主,纳于高庙。”^[2]建武六年(30),山东悉平,光武遣将伐蜀时,“幸长安,始谒高庙,遂有事十一陵。”^[2]此后建武十年(34)、建武十八年(42)以及建武二十二年(46)又三次幸长安。从辈份而言,光武为高祖九世孙,其帝位承西汉火统,可是西汉有十一帝,这样“光武第虽十二,于父子之次,于成帝为兄弟,于哀帝为诸父,于平帝为祖父,皆不可为之‘后’”^[2]。为了很好与图讖相应,光武对西汉诸帝作了“技术性”分化。“十九年(43)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成帝、哀帝、平帝于长安,春陵节侯以下四世于章陵。”^[2]光武将与自己平辈的成帝以及晚于自己的哀帝、平帝留于长安,祠昭帝、元帝等于太庙,于是自己直承元帝,以此解决辈份之问题,以应讖纬。

光武颇信图讖,最初便依图讖而定都洛阳。在十余年的征伐过程中,光武不断完善洛阳都城设施。建武二年(26)春,“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2]。五年(29)“初起太学”^[2]。十四年(38)“春正月,起南宫前殿”^[2]。十五年(39)议立太子,告祠宗庙,论功封赏。十六年(40)肃清“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2],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随着时间推移,洛阳都城建置不断得到完善,而“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2],因此,光武始终没有迁都长安的打算。可见,刘秀多次幸长安的主要目的是“归宗认祖”,强化其帝位的正统性,并无它意。幸长安时,光武除了祭祀高庙及汉帝诸陵之外,还对西京一些旧宫殿等作了部分修整,这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光武既承汉火德,当定都于旧都更合理,并且前有刘邦先定洛阳后迁都长安之先例。这些修补旧都行为引起了人们的误解,许多人以为光武欲迁都西京。于是人们议论纷纷,从而有杜笃《论都赋》等文章的产生。

事隔三十余年,迁都思潮再起。汉明宗后期,诸侯王多依讖纬谋反。广陵思刘荆因相工言其貌类先帝而欲起兵;楚王刘英“造作图书,有逆谋”^[2];济南王刘康“案图书,谋议不轨”^[2];阜陵质王刘延因“作图讖,祠祭祝诅”^[2]而治罪。这些谋反多止于未发,并未产生多少社会危害,但对人们心态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似乎都洛不应天命,于是杜笃迁都之议得到回应。“先是杜陵杜笃奏上《论都赋》,欲令车驾

迁还长安。耆老闻者,皆动怀土之心,莫不眷然伫立西望。景以宫庙已立,恐人情疑惑,会时有神雀诸瑞,乃作《金人论》,颂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2]王景作此文的目的很明显,借神雀、金人等诸祥瑞来印证都洛与符命相应。讖纬中有不少德致祥瑞的例子。王景《金人论》与王莽时“定帝德,国洛阳”的思路颇为一致,其实讨论的问题依然是一个:都洛应天命。此后班固、傅毅、崔駰等纷纷著文以表迁都之己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东汉初期的迁都思潮与图讖纠缠颇深,光武修辑旧都长安等行动实欲证明其应图讖、继汉赤德的正统性,却引发了杜笃等人迁都之念。事隔数十年之后,都洛是否应天命再次引发问题争端,导致了一场规范较大的迁都之议。

三、东汉末迁都之议

东汉末年,董卓入京专权,“明年,关东兵起,董卓惧,欲迁都以违其难。乃大会公卿议曰:‘高祖都关中十有一世,光武宫洛阳,于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长安,以应天人之意。’”^[2]董卓因害怕群雄讨伐而欲迁都长安,但他以《石包讖》为迁都的理由,这与王莽欲应图讖迁都颇多相似。杨彪对此提出异议:“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盘庚五迁,殷民胥怨。昔关中遭王莽变乱,宫室焚荡,民庶涂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阳邑。今天下无虞,百姓乐安,明公建立圣主,光隆汉祚,无故捐宗庙,弃园陵,恐百姓惊动,必有糜沸之乱。《石包讖》,妖邪之书,岂可信用?”^[2]杨彪等人的反对终归无效,董卓还是“迁天子西都”。在迁都过程中,身为尚书令的王允“悉收敛兰台、石室图书秘纬要者以从。既至长安,皆分别条上。”^[2]这些表明讖纬在当时依然为时人所重。迁都长安之后,汉献帝玩弄于众军阀之掌,汉祚不绝如缕。后来曹操迎天子于许昌,“自是迁都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2]自桓、灵以来,人们多认为汉行气尽,天厌汉德久矣,其亡非迁都之过也。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努力从讖纬中寻找魏代汉的“天命”依据。“当汉者当涂高”之讖产生甚早,光武与公孙述辨讖时曾言:“代当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2]后来人们将这古老的讖语附会于曹魏。《春秋元命包》:“许昌为周当涂”^[6]。《春秋佐助期》:“汉以许昌失天下”^[6]。于是人们认为,“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今魏基昌于许,汉征绝于

许。”^[7]诸如此类牵强地解说讖纬,为魏代汉寻找“天命”依据的还很多。如《春秋汉含孳》:“汉以魏,魏以徵。”^[6]《春秋玉版讖》:“代赤者魏公子。”^[6]《春秋保乾图》:“汉以魏徵,黄精接期,天下归高主;汉以魏徵,当涂在世,名行四方。”^[6]

以上分析表明,至东汉末,讖纬依然是迁都的重要理由,汉末的迁都并没有给汉帝国带来好运,反而导致了汉帝国的灭亡。

四、讖纬与汉代都城文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汉一代的迁都思潮无不与讖纬密切相关。讖纬不仅对汉代迁都思潮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对汉代都城文化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迁都——国家信仰危机的产物

如上所说,许多迁都之举往往与国势发展密切相关,但是汉代迁都之议与国家信仰危机密切相关,往往是国家信仰危机的产物。

讖纬是一种神话,是一种文明神话,它并不像原始神话那样是人们无意识和直接想象的结果,相反,它是“有计划地制造出来的”^[8]。当社会政治产生危机时,开始人们总想以理性的方式来解决;当理性无能为力之时,人们只得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神话,于是产生了文明神话。西汉后期,随着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的加深,人们对汉帝国失去了信心,“厌汉”情绪高涨,于是产生了眭弘的“择贤禅让”说、翼奉的“迁都更命”说等。人们普遍认为汉朝“更命”是必然的事,就连欲有所为的汉哀帝亦不能免俗,他先改年号,后又欲禅位于董贤。对汉帝国的信仰危机导致“汉当更命”之类的图讖不断产生,这些图讖最终将汉帝国葬送。王莽建立新朝之后,进行了大量的改革,这些改革多是“食古不化”的产物,不仅未能解决现实问题,反倒使各种矛盾不断恶化。于是人们不再对新朝怀有信心,反倒怀念以前的汉朝,人们由“厌汉”转而“思汉”,“思汉”成为人们反莽的政治纲领,“刘氏复兴”等讖言流行于世。为了证明“天命”在己,王莽欲依图讖而迁都,最终因大众的反对新朝的灭亡而未能实现。东汉明帝时期,由于诸侯王因图讖谋反迭起,导致人心动荡不安,于是一些人认为都洛不应天命,迁都思潮再次兴起。到了东汉末期,图讖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当危机到来时,人们依然想借助图讖寻找解脱。由此可见,汉代迁都思潮多是国家信仰危机的产物,当

人们对国家失去信心的时期,守旧者想以迁都来维护旧政权的统治,延长旧政权的寿命。

(二) 迁都——王权变更的手段

讖纬是人们制造出来文明神话,具有很强的政治功用性。讖纬托言于孔子,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往往成为人们实现特定政治目的工具。

东汉末年,大将军何进欲除宦官,密召边将董卓将兵入京。入京之后,董卓大权独揽,废少帝,立献帝,欺辱朝臣,残害百姓。当关东义兵起时,董卓颇为惶恐,欲迁天子于西京。为了做到迁都“有名”,董卓引《石包讖》为迁都理由。其实,其迁都目的非常明显,继续操天子于掌心,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果董卓不早死,迁都之后,废汉自立则是迟早之事。战乱之际,曹操迁天子于许昌,将天子置于自己掌控之中,开始了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代,为其子曹丕禅于汉奠定了基础。为了达到禅汉的目的,曹魏爪牙大肆编造汉禅魏图讖,如“汉以许昌失天下”,“代汉者当涂高”,“当涂高者,魏也”等。迁都许昌最终将汉帝国断送。由此可见,迁都往往与权力变更密切相关,往往是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手段。

(三) 都城——天命的象征

都城是一个国家中央行政所在地,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早期天命观往往着眼于帝王本身,如周武王顺天命而伐纣代商等。讖纬则将天命进一步神奇化、具体化。讖纬强调感神物而生是为圣王的前提,异貌是其非凡的外在特征,受命仪式则是其受天命、成为圣王的标志。在纬书中,受天命的主要形式是受河图、洛书,历代帝王都曾受河图、洛书。受天命之后,圣王方可建国立制,成为真正意义的人间帝王。这样,人们将都城与受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都城的建立是受天命的结果。于是都城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不再仅仅是中央行政区域的代称,而成为天命的象征。当“厌汉”思潮盛行于世时,汉“再受命”几乎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形势时,翼奉等人则提出迁都主张,想通过迁都改制来实现“更命”,从而达到挽救汉朝的目的。在翼奉等人看来,迁都不仅仅是都城行政区域的改变,更是天命的改变。王莽称帝之后,欲以图讖迁都洛阳,以神其天命。显然王莽将都城视为天命,只是因为众人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董卓迁都长安之后而汉朝不绝如缕,曹操迁迎天子于许昌之后汉朝“名存实亡”,最终禅位于魏。这些都表明,迁都不仅仅是都城的变迁,更是天命更替的标志,与朝代兴亡密切相关。

五、结 语

由上述可见,有汉一朝迁都思潮不时兴起,这些迁都思潮皆与谶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联。西汉后期,因社会危机加深,人们“厌汉”情绪越发强烈,反汉图谶越来越多,于是翼奉等人提出迁都之议,欲以迁都缓解汉朝之危机,延长汉帝国的寿命。新莽后期,社会反莽情绪高涨,王莽欲迁都以应天命,谶纬成为王莽迁都的主要理由。东汉初期,迁都之议前后相续了数十年。最初光武帝以图谶定都洛阳。光武既承汉火德,当定都于旧都更合理,并且前有刘邦先定洛阳后迁都长安之先例,于是一些士人主张迁都长安。明宗后期,诸侯王多依谶纬谋反,洛都是否应天命再次引发问题争端,于是迁都之议再起。董卓入京专权之后,欲避群雄讨伐,董卓以图谶为由,挟天子迁都长安。曹操迎天子于许昌,汉朝“名存实亡”,最终曹丕应图谶而代汉。谶纬对汉代都城文化产生了不少影响。汉代迁都思潮多是国家信仰危机的产物,当人们对国家失去信心的时期,守旧者

想以迁都来维护旧政权的统治,延长旧政权的寿命。迁都往往与权力变更密切相关,往往是权臣夺取政权的一种手段。受谶纬天命思想影响,都城不再仅仅是行政区域的代称,往往成为天命的象征,迁都不仅仅是都城的变迁,而是天命更替的标志,与朝代兴亡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 [1]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 [3] 刘珍,吴树平. 东观汉记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4] 王树民. 廿二史札记校证[M]. 订补本. 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 杨权. 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尧后火德”说考论[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6]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M]. 吕宗力,栾保群,译.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 [7]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8] 恩斯特·卡西尔. 国家的神话[M]. 张国忠,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 wei and thoughts in moving capital in Han Dynasty

WU Cong-x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en wei and thoughts in moving capital in Han Dynasty is analyzed in the paper. Some people advocate that moving capital to Chang'an could save Han Empire. WANG Mang moved capital to Chang'an for Chen wei; and the Emperor Guangwu repaired the old capital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his power, which led to the thought of moving capital for someone. Some people suspected that building capital in Chang'an was unfit to God's will, which led to the thought of moving capital again. DONG Zhuo moved capital to Chang'an for Chen wei, then CAO Cao moved the Empire of Han Dynasty to Xuchang. As a result, the Empire of Han Dynasty was replaced by CAO Pi. The auther finds that the crisis of belief was the important reason of the appearance of Chen wei, because politics became more mystical and unreasonab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hen wei. The capital, at that time, was already the symbol of God's will and the city of central authorities.

Key words: Han Dynasty; Chen wei; moving capital; political mythology